

《刘鹗年谱长编》后记

刘 德 隆

因时间所限，《刘鹗年谱长编》的写作不得不收笔了。虽然停笔了，但毫无轻松之感。因为虽有三十多年的积累准备，但是动笔之后才发现写作“年谱”如此之难，才体验到什么是“力不从心”。深知目前的《刘鹗年谱长编》存在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又希望尽快完稿，目前的我就处在这一矛盾之中。

2009年11月在张人凤先生的介绍下，在北京我愉快的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任雅君老师的建议：撰写《刘鹗年谱长编》。2010年3月在上海，任雅君老师、冯勤老师、我的弟弟刘德平和我四个人商谈，计划按交通大学出版社的要求在2011年5月完成《刘鹗年谱长编》全稿。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是动笔后还是发现，资料缺乏的确是一重困难，而有时所得资料相互矛盾，须费时考证、且不一定有所结果，更难免使人产生无所适从之感。两年来单位和社会又有许多无法推辞的新工作，致使交稿日期多次推迟。虽然任、冯二位老师对我表示理解，于我而言，不能按时交稿而影响编辑们的工作更感到歉意和压力。这就是我决定停笔写作的原因。否则慢慢修改、细细琢磨，再加之不断发现的新资料，完稿日期会一拖再拖，永无休止。但我真希望今后能够对《刘鹗年谱长编》再认真推敲、再细“磨”的机会。

我的本心是希望《刘鹗年谱长编》能尽力给读者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刘鹗。

刘鹗是一个凡人，因此应把他的七情六欲、他的喜怒哀乐反映在《年谱》中；

刘鹗出身于官宦书香家庭，因此应把他所具有的这个阶层的特征反映在《年谱》中；

刘鹗素以国事为己任，刘鹗颇多行善，刘鹗善于河工，刘鹗酷好文史、多才多艺、涉猎极广，刘鹗不拘等级、交往广泛等等。这些应反映在《年谱》中；

刘鹗愿与寡妇结交，刘鹗屡次与他人又在文物收藏中发生矛盾，刘鹗不讳言曾经将善款用于文物收藏等琐事也应反映在《年谱》中。

刘鹗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甚至对刘鹗所做的同一事件，研究者也会持不同的看法，这些也应该反映在年谱中。

我希望《刘鹗年谱长编》不是官方档案的组合、不是官僚书信的编年；我希望《刘鹗年谱长编》不仅是研究者的参考资料，而也能让读者在看到某一部分情节时，有产生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刘鹗一生的结局是悲惨的，他匆匆走完了自己短暂的53年的人生之路。但是世人并没有忘记刘鹗。争论刘鹗的功、过、是、非、是刘鹗研究的一个方面，仅仅我个人所见的国内外学者研究刘鹗和《老残游记》的专著约30本、论文800余篇；而搜寻整理刘鹗对国家贡献的事实是又一个方面，《抱残守缺斋藏器目》、《明盐杂考》、《黄河历史概述、治理和治河技术》等後人的著作就是明例。

在此《刘鹗年谱长编》完稿之时，有一些我不得不提及和由衷感谢的人。

我首先要记的是尊敬的周汝昌先生。周汝老是人们所尊敬的“红学家”。在红学研究方面，先祖刘大绅先生、先伯父刘蕙孙先生、先父刘厚泽先生，都与周汝老有许多默契。以至于我偶有一篇关于“红学”的短文发表，也得到周汝老的肯定和鼓励。但是我以为对“红学”的研究，只是周汝老的诸多研究课题中的一个，简单的称周汝老为“红学家”无法概括他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贡献。他的学识涉猎之广博，他对问题洞察之深刻，他极具个性特征的语言及感染力、他的大度及幽默，岂是一个“家”字能概括的？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周汝老就告诉我，他曾经将《老残游记》改写成杂剧并得到顾随先生的肯定。2009年11月我到北京拜望周汝老，谈到当今的人们调侃知识界“从前是文化太多，大师太少；现在是文化太少，大师太多”。确实在我的心目中，当今能被誉为“大师”的专家学者可谓寥寥。周汝老不假思索的回答我说：“大道无名 大师无界”。“说者无意”，那时，我立刻想到，我不正是与一位大师在对话么？周汝老被誉为“大师”应是当之无愧啊！周汝老不断把自己创作的有关刘鹗和《老残游记》的诗词赠送给我。2010年，应我之请，周汝老又以《奉题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惠我以为《刘鹗年谱长编》的“序”。因此在《刘鹗年谱长编》完稿之时。我简单叙述周汝老对我的关心，以表示我的谢意。

张人凤先生是我国近代出版事业奠基人张元济先生的文孙，他完成了《张元济年谱长编》并促使我走进了“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的队伍。在编著《刘鹗年谱长

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交流。我们的共同体会是，写作“年谱”如同“破案”，根据一些蛛丝蚂迹，可能会牵出意想不到的新的资料；几个孤立的事件被前后串联起来，才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如做几何题目，几个“因为”之后，才能得出一个“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张人凤先生还不断将他发现的新资料提供给我。所以在这里要对他说一声谢谢。

日本大阪经济大学的樽本照雄教授是研究晚清小说、研究刘鹗的专家。《刘鹗年谱长编》中的许多基本资料，都录自他所编辑的《清末小说》杂志和《清末小说通讯》杂志。在编著《刘鹗年谱长编》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的向樽本照雄先生请教，都能得及时的回答。

长春师范学院的郭长海教授是研究刘鹗的专家。《刘鹗年谱长编》中许多资料都来源于他多年对资料的搜集、整理。

上海长宁教师进修学院的蒋人杰先生，他用自己丰富的古文字知识，为我解决了《刘鹗年谱长编》中关于“文字”的许多困难。

应该感谢的还有更多的人。北京的丁进军先生供职于中国历史档案馆，上海的彭长卿先生喜爱书画收藏，上海的柳和城先生是“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的作者之一，梨花大鼓的传人左玉华女士最能体味《老残游记》中的白妞说书的章节……他们在发现了新的材料之后，会立刻将材料发送给我。这样的同事、朋友不是一个两个，无法一一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他们。

从1980年起，我与我的姐夫朱禧、弟弟刘德平开始了对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1984年出版了《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1987年出版了《刘鹗小传》，1998年出版了《刘鹗散论》，2007年出版了《刘鹗集》。现在的《刘鹗年谱长编》，也是我们集体工作的成果。我的兄弟姐妹刘德隅、刘德符、刘德枢、刘德棻、刘德威、刘德康，表哥朱松龄都是我们研究的支持者，也是我的著作最严格的检查者。

我无法一一的写出所有支持鼓励我的人的姓名。但是我必须提及我的父亲刘厚泽先生。

先父刘厚泽先生是一个知识渊博、国学根底深厚、乐观、幽默、心地善良、多才多艺的人。可惜的是他的少年、青年时期生活在战乱中；他的中年、晚年又在压抑中渡过，1970年仅仅55岁的父亲就倒在那“史无前例”的混乱年代里。尽管障碍重重，整理研究有关刘鹗和太谷学派的遗物资料一直是他的心愿。先父生前历经波折编辑了

《老残游记资料》（1962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并将刘鹗和太谷学派的一些珍贵文物资料捐献给了国家。近年我们根据父亲与蕙孙伯父通信手迹，自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沪榕书札》；搜集父亲的文稿，自印了《一蓑风雨任平生——厚泽文存》两书作为对父亲的纪念。编辑《刘鹗年谱》是父亲的心愿，他用所保存的刘鹗资料，写出了《黄河历史概述、治理和治河技术》、《明盐杂考》等长篇文章。两篇长文不是刘鹗的著作，但确是刘鹗遗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们将这两篇文章收录在《刘鹗年谱长编》中，一方面是让读者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刘鹗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是表达我们对父亲的缅怀。

我们是幸运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在出版事业并不景气的情况下出版《刘鹗年谱长编》，使父辈与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我们要大声对他们说：谢谢你们！

我们要对读者说：《刘鹗年谱长编》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请你们批评，请你们指正。如有机会，我们一定认真的修改，使它更符合史实、更趋完善。 囧

2012年5月30日

(LIU DeLong)